

史學派經濟學

朱謙之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 錄

蔡子民先生序	1
第一章 緒論	1
第二章 歷史學派的根本觀念	14
第三章 歷史學派的國民經濟學	50
第四章 歷史學派的經濟發達階段說	90
第一節 <u>評馬克思派經濟階段底理論</u>	90
第二節 經濟發達階段說的性質	110
第三節 經濟階段說的分類	163
第四節 <u>李士特的經濟發達階段說</u>	170
第五節 <u>格洛士的經濟發達階段說</u>	184
第六節 <u>羅協兒的經濟發達階段說</u>	192
第七節 <u>希德布蘭的經濟發達階段說</u>	198
第八節 <u>畢喜兒的經濟發達階段說</u>	219
第九節 <u>石慕勒的經濟發達階段說</u>	270
第十節 <u>桑巴德的經濟發達階段說</u>	279
第十一節 經濟階段的心理化說	291
第五章 歷史學派批評的批評	314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

(二〇二〇九)

歷史學派經濟學一冊

每册定價大洋玖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
作
者

朱謙之

發行人

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

上海河南路

印刷者

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
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上海及各埠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（本書校對者 程際選 秉公）

程曉
選乘
公全

序

法人孔德氏說人類進化，分爲神學，玄學與科學的三級；近代學者，無不以由玄學而嬗於科學爲目的，是我們所能公認的。科學的異於玄學，就是舍演繹法而用歸納法。但同是用歸納法的科學，因對象的不同，而得區爲兩類；一是自然科學，一是歷史科學，前者在剔除歧異之影響而求得反復不變的因果；後者在觀察類似之事實，而表出特別不同的關係。各有領域，不能相易。經濟學的成立，實始於古典學派，此派純用演繹法，以個人的利己性與自由競爭爲出發點，欲求得一抽象的超時間空間而永久不變的原則，以應用於一切；是貌爲襲用自然科學的法則，而結果乃蹈玄學的覆轍。馬克思派反之，乃參用歸納法，而又欲執著階級鬭爭的理論以建立一成不變的公則，乃不得不利用黑格兒的辨證法以爲護符，於是又成爲半科學半玄學的組織。純粹用歸納法的，惟有歷史學派。歷史學派中，雖也有新舊的區別，而且經濟學中是否由國民經濟學而進於世界經濟學，亦

爲值得研究的問題；然而歷史學派的經濟學，確比古典學派與馬克思學派爲進步，是無可疑的。我國經濟學說，雖自管子時代，已有甚精的格言，然二千年來，迄未有科學的組織。直至十九世紀，始有侯官嚴氏所譯之斯密氏原富，是屬於古典學派的。最近時期，又有譯述馬克思派的著作，然亦零星小著，無關宏旨。至於純粹歷史學派的著作，則譯者較少。朱君謙之，素治玄學，著有虛無哲學等書；近則由玄學而進於科學，於歷史學派的經濟學，研究甚深；特編此書，不特於歷史學派與古典學派及馬克思派的異同，分析甚精；而且於歷史學派中各種經濟發達階段說，詳悉敘述而加以批評，於我國經濟學界，必有重要的裨益，可以斷言。所以略誌緣起，藉爲介紹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蔡元培。

歷史學派經濟學

第一章

緒論

歷史學派 (Historical School) 是近代一羣重要學者，應用歷史精神和方法到社會科學上的一個新運動。不但經濟學史上有歷史學派，政治學上法律學上也有歷史學派。如葛退爾 (Gettell) 在政治思想史 (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) 中，即有“政治思想的歷史學派”一章，歷舉德國歷史學派的薩維尼 (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)，英國歷史學派的梅茵 (Sir Henry Maine)，美國歷史學派的柏哲士 (John W. Burgess)；實際直到現在，根據於歷史的考察來研究政治和法律發展的學者，

恐怕比從前還要佔勢力吧！奧彭衡 (Oppenheimer) 雖反對新歷史學派，而他所著的國家論，卻完全引用歷史方法來講明國家制度的發達。法律學上的新歷史派即社會學派 (Sociological School)，也有代表人物。如 Erhlich, Holmes, Pound, Cardozo 等，可算法律學幾大宗派中最大的一派。可見從廣義來說，歷史學派的運動，在多數學者努力之中，是沒有間斷過來的。不但如此，現在最出風頭的，不就是馬克思派？馬克思 (Marx) 不是做過“歷史法學派之哲學的宣言”來反對歷史學派之淺薄傾向？（改造社版馬克思·燕格兒全集頁 195-200）然而很奇怪的，當他批評歷史學派最利害的時候，即他最受這一派影響的時候。他那篇論文極力批評歷史學派的元祖韋柯 (Vico)，而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節的腳註，又那樣地注意他。（他的女婿拉發格 (Paul Lafargue) 著“正義·神靈的唯物史觀”第一章馬克思的歷史方法，第三節即專論韋柯的歷史法則，可見影響之大了）。而且我們即就馬克思所說“經濟的社會構成之進步的階段”，即概括之為“亞細亞的，古代的，封建的，及市民的生

產方法”的發達階段；似此應用的歷史的觀察，來建立經濟發達階段的法則，和歷史學派的經濟階段說，還有什麼不同？歷史學派誰也知道他是受黑格兒（Hegel）哲學的影響很大，但馬克思學說，亦何能跳出此例。可見馬克思派雖反對歷史學派，實際上他也正是一個歷史學派的產物，的的確確是一個歷史學派的學者。他的有名的“共產黨宣言”，在一八四八年，和歷史學派三大建設者之一人希德布蘭（Hildebrand）的“現在及將來的國民經濟學”同年發表，這不就是很明顯很可注意的事實吧！所以我們現在經濟學的問題，不要像從前那樣徬徨不定，我們很可以把問題縮小，來問一問我們是要遵循歷史學派當中的那一派？馬克思一派，還是李士特（List）一派？還是希德布蘭一派？還是……？這麼一來，歷史學派的討論範圍就擴大起來了，然而我這一本小書，初意並不準備將馬克思派立即加入，所以這裏也只表過不提。本書的最大目的，只要能夠簡簡單單地講明研究經濟學上的歷史學派，即十九世紀中葉德國的歷史學派就完了。

原來德國歷史學派，在思想方面是對抗第十八世紀斯密亞當 (Adam Smith) 李加圖 (Ricardo) 等基於演繹法所成絕對主義的英國古典派經濟學，而主張歸納的相對主義的歷史方法。但這歷史方法，據許多學者都說是受了黑格兒主義 (Hegelianism) 的影響。韓訥 (Haney) 的經濟思想史和葛退爾 (Gettell) 的近代政治思想史，差不多有同樣的論調。據我看來，黑格兒 (Hegel) 哲學在德國當時實已鑄成了純粹的德國社會學的形態，所以德國社會科學的創設者，無論是馬克思，燕格兒 (Engels)，抑為經濟學家而兼政治學家的施泰因 (Lorenz von Stein 1855-1888)，他們幾位都是引用黑格兒學說於經濟學方面去的。（參看加田哲二著近世社會學成立史頁 206）馬克思不要說了，尤其是施泰因，承認經濟學與歷史觀念相關聯，實為德國從古典主義過渡到歷史經濟學派的一大思想家，他的社會政策的理論，也實為後來石慕勒 (Schmoller) 所本。過此便是那一位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羅協兒 (Roscher)，他所受黑格兒主義的影響，更為顯明。總之黑格兒據斯班 (Spann) 和威瑟 (Wiese) 告訴

我們，他是德國社會學的開山元祖，比康德 (Kant) 菲希特 (Fichte) 的貢獻還要重要些，所以我們假說歷史學派爲黑格兒主義方面的發展，也實在有充分理由。何則？黑格兒主義影響於歷史經濟學派者，有可注意的兩要點：第一是“進化的方法，”據費雪 (Kuno Fischer) 對於“黑格兒哲學解說”（原著見近世哲學史的第八卷，坂上絢一郎譯，黑格兒哲學解說頁 1—15）則黑格兒的出發點，即爲世界發展又世界全現象，尤其生活全現象的進化觀念。不消說這種特出的進化思想，給歷史學派以一大刺激，使他知道經濟生活是一種與時代共同進化的連續，牠是不斷的創造，又能進步的；因此而古典學派的絕對主義便推翻了。第二是“歷史的方法，”我們讀過黑格兒“歷史哲學”的，不能不承認他是已經貢獻了劃時代的歷史的方法，對於一切社會科學的諸形像，如國家，法律，宗教乃至人生的諸領域，都能從歷史的過程形態去觀察他。一面具體的認識那些事象過去的軌道，即一面預測現實的必然的歷史的步驟，這種特出的歷史的思惟的考察法，一轉便可應用於經濟學，成功爲經濟

之歷史的考察法（歷史學派），與歷史之經濟的考察法（馬克思派），於是而種種經濟發達階段說發生，而古典派的抽象演繹法，便應手倒下來了。由上可見歷史學派實淵源於黑格兒主義的方法，在黑格兒本身生前雖沒有系統的發表過經濟學，〔“人倫的社會體系”（System der Sittlichkeit）乃是未完稿，並且很不明瞭似的。〕而事實上歷史學派因為有可靠的進化的歷史方法做根據，便成就了比黑格兒還要進步許多的經濟學說。就是馬克思走錯了路似的，想用黑格兒辯證法組成經濟的理想，（最好笑的是他們的財產的辯證法，自相矛盾。如馬克思以私有財產為肯定的階段，燕格兒則以共有財產為肯定的階段，那末叫我們後學要如何適從？怪不得克魯泡特金（Kropotkin）要大呼打倒辯證法了。）然而他的成就已經是青出於藍，不過比較於歷史學派，則馬克思派未免玄學的色彩太多，而後者的優點，則更接近自然科學的方法罷了。

但從另一方面看，則歷史學派雖受黑格兒哲學的影響，卻不止單受黑格兒哲學的影響的。在這裏我可以依

據殷格郎(Ingram)著“經濟學史”(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萬有文庫內胡澤許炳漢譯)第六章“歷史學派”(第三冊頁 23—85)的幾段話，知道除了黑格兒以外，歷史學派實受孔德(Comte)的影響最大。“據孔德觀察，社會學的主要點，當如下述：——(一)社會學一定是一種科學。在此科學裏面，凡社會狀況的一切要素及其彼此的關係，和交互的動作，統通要研究的。(二)社會學包含動態的和靜態的社會學說。(三)社會學排斥絕對論，以循序變化的概念，代替抽象固定的概念。(四)社會學雖不排除其他講學法，卻是牠的主要方法，是歷史比較法。(五)社會學充滿了道德觀念和社會責任思想，與從〔天則〕(Jus naturae)論所推演的個人權利相反。(六)社會學的精神及其實行結果，都趨於實現一切構成〔公共正義〕(Popular cause)的大目的。(七)社會學雖以此爲目的，卻是企圖實現，是利用和平的方法，以進化代替革命。”(頁三十三)這上述各種特點，可說和德國歷史學派的全部學說完全一致，尤其是關於社會動態的研究；孔德派承認“社會學自有，而

且必須有牠的研究範圍，和特殊的研究法，牠的範圍即是最廣的歷史範圍，包含同時代的事實，而牠的主要研究法，——雖不是唯一的研究法，——如我們說過的，即是社會學之比較法，最適當的稱之爲〔歷史法〕(historical method)'' (頁三十五)。將這種歷史法適用於經濟學，便就是歷史學派的見解。不但如此，孔德在他的實證哲學以及他的實證政治學(Politique Positive)的許多地方，對於從前經濟學者的一般觀念和研究法，都提出或暗示反對，特別是對於我們所說的李加圖及其黨徒的觀念和方法，予以非難。約翰穆勒 (J. S. Mill) 曾對孔氏的評語發生憤怒，說“此種評語，實足以見孔德之如何淺薄；”(頁三十七) 由這憤語，可見孔德和古典派經濟學者是怎樣衝突。不過問題卻有一點，就是孔德思想雖如何接近歷史學派，而歷史學派事實上還不肯老實承認是受他的影響，如克尼斯(Knies) 就是好例。他所著“站在歷史方法立場上的經濟學，”依殷格郎的批評，“他對於歷史法之解說和闡發，於孔德之所成就者毫無增益，氏書的篇二版刊行於一八八三年，在此版

裏面，他作一個奇怪的聲明，說當他在一八五二年撰著此書的時候，對於這種由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二年就已出版六集的實證哲學，他完全不知道，並且他又說，或許所有德國經濟學者，都不知道。這種說法，頗於他們心地的光明上，或是文字的縝密上，發生疑問的。設若我們記得穆勒在一八四一年已經與孔德通信的事，和一八四三年出世的邏輯學 (Logic) 裏頭穆勒稱頌孔德的話。可是，克尼斯嗣後研究孔德的作品時，他告訴我們說，他在此書中發現這樣多與他的結論相同的意見，令他驚詫不已。他或許是很驚詫，因為他的方法論中真正有價值的見解，而被孔德說來，則規模較大，魄力亦較雄厚了。”（頁四十二）其實不但克尼斯如此，最明顯的如希德布蘭，他關於改良經濟學所立的目標，不受歷史派法律學的感動，而是受言語學的感動。迪爾 (Karl Diehl) 在他的 Theoretische Nationalökonomie 頁 213（此據住谷悅治經濟學說的歷史性階級性頁一四 §1）說，“不管羅協兒用歷史法律學的方法，希德布蘭卻以歷史的言語學為依據。”（Wie Roscher die historische Juristenschule

So hat Bruno Hildebrand die histor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als Vorbild genommen) 這樣兩種根據的不同，即無異告訴我們，黑格兒主義與孔德主義的不同。因為十九世紀言語學的進步證實了人類言語是經歷史上秩序的變化，以成現今的言語，經濟生活，同樣地亦經過歷史上秩序的變化而演成現代的經濟生活。因此希德布蘭遂採用言語學的道理，而應用於經濟學，結果在經濟研究上，也主張以相對觀念，代替了絕對觀念。我們再轉眼看希德布蘭“現在及將來的國民經濟學，”有對於蒲魯東(Proudhon)財產論的有名的敘述，(頁239—256，在許多蒲魯東研究者如 Salomon, Zenker, Dube, Mülberger 中，他也是應首屈一指的。)然而蒲魯東和孔德是有思想上的關係，(只要注意在一八五七年九月八日舉行孔德葬式時，蒲魯東是在許多參列者之中，就很夠證明他們是同調的了。)那末希德布蘭能說沒有間接受着影響罷！總而言之，歷史學派實兼受黑格兒與孔德兩大導師的影響，可說就是這大思想的一個綜合。他們的優點，是在有這兩大思想的長處，而捨棄了他們短

處，這一點拿來和馬克思派比較，似乎又勝着一籌的了。

於是從歷史學派思想的背景，移到研究當時發生的社會背景時，最喚起我們注意的，是按那時德國的情形，和中國現時情形，差不許多。一八三三年的關稅同盟，可算歷史學派元祖李士特(List)根據各國歷史事實，提倡保護關稅論的成功；然而細察那時情形，和在次殖民地的中國，因受國際的經濟壓迫，以致八十年來農業衰落，工業凋零，民生憔悴，國勢衰弱，一直弄到如今纔主張保護政策，而有所謂關稅運動與裁釐運動發生，這不是和李士特的學說背景，恰恰相同的嗎？我最好在這裏把馬寅初先生“馬克斯學說與李士特學說二者孰宜於中國？”一文（見馬寅初演講集第一集）所述德國當時的社會背景，摘錄其條目如下：

- （一）內地稅之遍設；
- （二）國境關稅之廢滯；
- （三）企業家之要求；
- （四）商務上之統一。

原來德國在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〇年，國內正是四分五裂的時候，關內遍設釐卡，即普魯士一邦，亦有八十七處之多，各處又復不相規定。其次德國當時對於國境關稅不甚注意，如進口稅之類，均無規定，且極微弱，故製造品輸入甚多，國內商業因而不振。又德國當時一般企業家，尤其是紗廠方面，因英美商業發達，輸入之貨甚多，均請政府實行保護政策。又德國商務稅統一較政治統一爲先，故先實行廢除內地稅，當時以各邦自行聯盟，定有一定之稅率。（以上節錄演講集頁 223—226）

由以上種種情形來看，可見德國和中國經濟現狀相同，歷史學派在德國是有他不可遁的社會原因，同樣在中國因爲情形相同，自然而然地歷史學派也有漸漸抬頭的傾向。只要看看提倡保護的關稅政策和裁釐政策，爲什麼能夠實行，就可見這都是經濟趨勢中必然的歷史使命的了。再進言之，在德國所發展的新歷史學派，如石慕勒（Schmoller）從倫理的見地來解決社會問題，如一八七三年設立社會政策學會，一面對外爲反抗英國的資本主義而反對古典學派的經濟學，一面對內爲促進自國產業